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常宝  
著

漂泊  
的  
精英

社会史视角下的  
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  
与蒙古族精英。

WANDERING ELITES:

THE INNER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ELITES FROM QING TO  
REPUBLIC OF CHINA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漂泊精英

社会史视角下的  
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  
与蒙古族精英。

常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精英：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 / 常宝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0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683 - 8

I ①漂 II ①常 III ①社会变迁 - 研究 - 内蒙古 - 近代  
②蒙古族 - 名人 - 人物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K292 6  
②K828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4755 号

·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 漂泊的精英

——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

著 者 / 常 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郑 娜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5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447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683 - 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 一 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帝国”传统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最为辉煌的年代。当时中原地区在农耕、建筑、冶炼、纺织、运输、陶瓷等领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经贸活动以及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和天文、地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诸领域等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争论中，逐渐浮现出了古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宏大框架，为中华文明在其后三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诸多哲人、学者在哲学、政治体制、社会组织、思想伦理、法律、军事等许多领域提出的思想和原理，至今仍然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不断地启发着后人的理论思考与政治智慧。

从秦汉直至鸦片战争前这两千年可以被看做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政治理念和行政体系可以大致以“大一统”的“天下帝国”来表达。“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关于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赵汀阳，2005：40）中国人思想中的“天下”是一个以中原王

朝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被边陲“蛮夷”部落所烘托的完整的世界体系<sup>①</sup>，而西方世界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则大多是几个帝国对峙的历史，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框架和文明体系。在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中，其基本框架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这个“天下”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之孕育发展的地理空间和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知识。中华各族繁衍生息的东亚大陆在生产水平低的古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费孝通，1989：2）。“天下帝国”理念的产生，与这个四周有自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这个地理单元“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费孝通，1989：2）。

在这个地理单元内部，又可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个部分，而且核心区之所以成为核心区，边缘区之所以几千年仍然是边缘，又与它们各自的地理自然特征密切相关。自秦统一六国后的各个朝代里，核心区始终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过人口迁移和新农业区的建立，帝国的核心区从黄河流域逐渐向南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同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行政体制通常存在明显的差别——核心区实行的是郡县制（行省制）和中央集权制，而在边缘区实行的是各种形式的世袭部族首领自治制度。这种世袭部族首领制度，与中亚地区和中世纪东欧的“部族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各部族民众的认同体系和直接的效忠对象仍然是本部族的世袭首领，并通过首领来间接地接受皇帝的权威。而在核心区实施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帝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全体臣民效忠“天子”。二者的效忠体制和认同体系很不相同。

在传统中国这个“天下帝国”中，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列的“二元结构”；当各边缘区之间在语言、宗教、社会组织传统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时候，中央朝廷会在不同地区实行各不相同的治理体制，从而造成一种“多元结构”。在这种体制下，边缘区各部落的首领和普通民众并不熟悉也不接受核心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模式，皇帝和朝廷是二者的连接点和共同接受的最高权威。

---

<sup>①</sup>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近代自欧洲输入的“民族国家”式的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赵汀阳，2005：44）。

在文化模式和认同意识方面，核心区被认为是代表“中原文明”的“华夏”，而居住在边缘区、具有与中原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特征的群体则被核心区的中原人群称为“蛮夷”。在“有教无类”传统的影响下，正是“变夷为夏”的“教化”过程使部分边缘区逐步转化为核心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主要指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费正清，1987：73-74）其他学者强调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张磊、孔庆榕，1999：285）

因此，凡是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尽管其外貌特征与语言习俗可能与中原存在差异，但仍可被视为“华夏”，而尚未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夷狄”。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这个国家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金耀基，1999：614）。因此，华夏和蛮夷之间是一个动态并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用于区别两者的是“教化”程度即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在归纳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东亚大陆边缘区的这些“蛮夷”群体，也始终把自己放在“中国”这个“天下体系”当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不仅存在强大和持续的文化和经济向心力，也存在若隐若现、时强时弱的政治向心力。

边缘区各“蛮夷”首领的地盘和实力是有差异的。当核心区的中央皇朝强大时，他们俯首称臣，朝贡纳税；而当中央皇朝因内乱呈现衰败迹象时，边缘区比较强大的族群就会择机内侵，逐鹿中原，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央皇权，“奉天承运”，改朝换代。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蒙元王朝、清王朝等即为蛮夷成功进入中原的代表时期。中原地区繁华的大都市、兴盛的农业、庞大的人口、巨大的物质财富、发达的文化生活都对边缘区的蛮夷群体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当这些边缘地区的蛮夷部落

一旦成功“入主中原”，在尽情享受中原地区的繁华财富和文化生活时，他们也就不不可避免地逐步融入到中原文化和人口之中。

作为以东北地区的“蛮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边远地区的势力扩张方面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通过各种征伐与怀柔政策把西北、西南大块边缘地区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清朝参照各地的不同传统，实行了“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除了“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外，清朝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分别实行不同的行政和法律体系。在充分地发挥其怀柔效果的同时，这种体制设置在客观上也阻碍了这些边缘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王柯，2003）。

在鸦片战争及以后几次抵抗列强侵略的对外战争中，中国这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被外来的帝国主义军队彻底打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攫取直逼中国边境。北方的沙俄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中亚，东方的日本强占了朝鲜、琉球和台湾省，南方的越南等国被法国占领，西南的印度、缅甸等地被英国占领，而且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的攫取目标，十分清楚地指向中国的边缘地区（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在这个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天朝秩序”已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这个“天下帝国”在四周强敌逼迫之下只能一步一步极不情愿但又十分无奈地朝着“民族国家”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孙隆基，2004：21）为了达到分裂和瓜分中国的目的，垂涎中国领土和财富的帝国主义列强把边缘地区的各部族也冠之以“民族”（nation）的名号，鼓动他们从中华帝国中分裂出去。此时，中华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蛮夷”框架已被外部武力无情地打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之一大变局”，指的正是这一中国国家体制在全新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根本性转变。

## 二 从传统的“天下帝国”向现代 “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

自鸦片战争起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10年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中的第二个时期，也可称为中国的近现代时期。在这一百多

年里，中国一直是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对象。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7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1884 年中法战争，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通过战败被迫签订的前后几十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割让了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使这些土地上居住的国民沦为外国统治，甚至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沿海和内地的大城市也出现了洋人直接管辖和耀武扬威的“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和军舰随意出入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使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以亿两白银计算的战争赔款，更使中国民众陷入了几无生计、前所未有的困苦境地。

在这样的危急情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开始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国难即在眼前。承继了几千年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构建的“天下观”政治格局和以“华夏文明”对周边“蛮夷部落”施以“教化”的“文化中心主义”族群观的思维传统，在新兴欧洲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已无法延续，中国人从此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外交游戏规则。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西方知识体系和自身的理解与思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一条现代意义的“民族构建”（nation - building）之路。

为了抗御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战争，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开始调整原来“多元式天下”的行政管理制度形式，实行了一系列推行“新政”和“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如在外蒙古实施行政改革的“新政”，开放华北汉人向东北三省的大规模移民，在内蒙古南部地区推行“放垦”，1884 年新疆正式建立行省，在西南各地加紧推行“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等，这些都是当时清政府主导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又如 1905 年的“废科举，兴新学”，在多地设立同文馆，翻译西方和日本的各类文献，官员推动的内容不一的“洋务运动”。凡此种种，都可被视为我们这个具有古老传统的“天下帝国”朝向工业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前进途中的蹒跚步履。

在“天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绩，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权势日衰的大环境下，中国各边缘地区的“蛮夷”部落必然会思考自己今后的地位与权益将如何维护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的首领人物、知识精英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触来自欧洲的“民族”概念和接受“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政治理论的影响，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他们和他们

所属的部族面临多种选择。其中有些部族（如内蒙古科尔沁部）的首领世代享受清朝皇室的厚恩，始终坚持拥戴清朝；而有些部族首领则在外国势力的鼓动下开始试探从清朝分裂出去，转投某个列强的门下，并幻想能够依仗外国势力的支持寻求“独立”。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这些部族（其中许多在1949年以后被中央政府识别为“民族”）首领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青年知识精英必然因受各方势力的影响而出现政治分化，在效忠中国中央政府还是投靠外国势力寻求独立之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根据情势而犹豫徘徊于两者之间。发生在少数部族政治与知识精英中的这一政治分化，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变得更加清晰。

那么，在这一国家政治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坚持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始终效忠于中央政府？有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开始对中央政府耍两面派、暗自筹划独立？有哪些部族精英集团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发生分裂？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影响这些精英人物分化路径和政治选择的因素都是什么？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必须弄清楚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从我们目前所读到的研究文献来看，现在的研究者大多还是从中央政权的视角居高临下地分析和解读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宣言、政策文本、档案资料、主要官员的回忆录等。也有一些人论及当时中央政府与边疆部族首领之间的互动，但是至今很少有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放在分析边疆部族精英人物的思想演变和政治谋略方面，更是极少采取“换位思维”的研究方法，尝试着站在这些边疆地区特定利益和当地族群精英人物的特定立场来理解和分析他们的言论与行为。

毫无疑问，为了分析核心区的中央政府与边缘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精英人物的双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央政权的政策和做法是必须研究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思想与行为的研究，那么，对这一互动过程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不仅当时的中央政府（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需要在自身的政府机构、行政管理的思路和做法上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从“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趋势，各边远地区的部落首领和精英，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和政治纲领。只有把这两个层面和不同群体代表人物的思想演变和行动轨迹放在一个系统当中来加以分析，我们才能在宏观和整体上把握民国史的基本脉络。

从这个多元互动的视角来看，分析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精英人物的思想过程和政治选择，对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多部族“天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个传统的多部族大帝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来的版图，是最终彻底解体还是基本保存原有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地区各部族首领在他们与中央政权、外部势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最终作出的政治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比喻为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这一进程的钥匙，应当是不过分的。

### 三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是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中，西南的云南、广西、贵州建省设县较早，不同族群长期混杂居住，族际通婚十分普遍，政治离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西藏、新疆、青海、内外蒙古、满洲（东北）这五个地区在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与核心区差距较大，在鼓动这些地区部族与中央分离方面，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所下的工夫也最大，因此也最需要我们以这些地区为对象来开展研究。近年来，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以西藏上层集团主要人物（牙含章，1963；1987）、青海宁夏回族军阀（杨效平，1986；吴忠礼、刘钦斌主编，1993；丁明俊，2001；许宪隆，2001；师纶，2006；陈秉渊，2007）、内蒙古上层精英和领袖人物（札奇斯钦，2005；《乌兰夫传》编写组，2007）、新疆地方汉族军阀和“三区革命”（张大军，1980）等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专题研究，从整体上看还是十分有限的，对西北马家军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步芳和马福祥两个人。

以少数民族精英人物为对象的专题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开展，历史叙事式的传记类研究固然需要，但是当我们的关注点是当时边疆地区社会在政治上从传统“部族—天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时，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重点，就是他们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形成与演变。从这个视角来看，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在这个方面是着力不够的。

我们2011年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组织了三篇文章，作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观与民族观”专题笔谈（常宝，2011；关凯，2011；菅志翔，2011）。这组文章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即着重分析这些精英人物关于现代“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是什么，分析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和中国整体、中央政府的关系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内，以及在他们的一些重要行动如何体现出其政治立场和对中央政府的基本态度。

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来说，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必须面对并处理三种基本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与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民族观”密切相关。

第一，是如何处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清朝“多元式天下”的统治体制下，这些部族的王爷、土司、噶伦、伯克、头人长期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在皇朝衰败、民国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这些少数民族首领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扩大自己的自治权，并在外力支持下谋求政治分离；二是继续效忠中央政权，争取在新的国家体制下以中央任命的职位来保持对地方政治和各种事务的影响力，他们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合法性依然来自中央政权的任命。第一种选择的危险是面临中央政府的武力征伐，所依赖的外部势力在危急时刻并不一定可靠；第二种选择也使他们面临失去权力的某种风险，因为存在随时被中央免职并被他人取代的可能性。在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中，“地方服从中央”是一个基本准则。他们最后的选择究竟是什么，传统上延续下来的政治和文化向心力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管理策略和这些部族精英的个人政治智慧。

第二，是如何处理当地各族群间关系的问题。我国许多边疆地区都是多族混居，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历史上即形成了各种多层次的权力结构。如果在一个地区占主导的部族首领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对其他群体实行歧视、压迫的政策，必然恶化族际关系、激发民族冲突，也会引发该地区与中央政府和邻近地区之间的矛盾。例如在青海执政的马麒、马步芳父子就面临如何处理与协调当地藏、汉、回、蒙等各族关系的复杂问题。

第三，是如何处理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边远地区居住着各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甚至一个宗教内部还存在

不同教派（如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和门宦、藏传佛教中的不同支系等）。如果地区的执政者对居民中的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人民间宗教、萨满教等组织和信众不能一视同仁，也可能引发教民之间的矛盾和宗教冲突。

围绕着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民族观”、“国家观”的产生和演变来分析近代中国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族群互动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以及它对今天中国社会民族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常宝在这组笔谈中发表的文章《“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常宝，2011），以清末和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社会变迁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回顾了内蒙古地区行政体制演变的历史，通过各种史料展示了蒙古族王公和精英人物受到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影响后出现的“现代性”叙述和“传统性”叙述这两类倾向，在拥戴清朝、接受共和、寻求独立这几种选择中最后出现了分化，生动地描述了各地蒙古王公和精英人物在民国这一历史转型期中表现出来的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混乱与多元。这篇文章所讨论的主题正是本书的主线。

## 四 常宝的《漂泊的精英》

2006年常宝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民族社会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的四年学习期间，他系统地选修了社会学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参与了我们在西藏等地区组织的专题社会调查和各项学术活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在讨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考虑到他的蒙古族背景和生活经历，我们最后选定民国时期内蒙古民族精英的社会活动与演变历程研究作为他的论文选题。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汉文、蒙文史料和日文、英文文献，收集了许多当时有影响的蒙古族精英人物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文献，并在内蒙古地区对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老人开展了口述史访谈，最后以《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社会变迁与蒙古族精英流动研究》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2010年6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这本《漂泊的精英——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主要采取的是社会史的分析视角，结合族群社会学的认同意识研究、族群分层与流动理论、族群互动机制等分析工具，努力从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活动变迁以及内蒙古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过程来理解内蒙古社会演变的宏观走向和主要特征，并试图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解读和分析蒙古族精英人物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的历史作用。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精英流动及其机制”的分析框架，其中包含了地方精英的族群身份、家族、教育、婚姻、社会关系网络、民族运动、革命这七个“自变量”。这个分析框架为读者理解和分析当年风云变幻的内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主义运动历程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性的分析工具，对于这些因素所进行的分析，也非常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蒙古族精英群体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如因素之一的“民族运动”或者说“民族主义运动”，就是由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发起并引导的以“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锻炼、淘汰并造就了一批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族群精英人物。常宝提出的分析框架中的这七个因素或“自变量”，对于我们认识内蒙古地方精英的历史演变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蒙古族精英活动的考察和分析时，也许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第一，在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精英产生和流动机制中，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所起到的拔擢、鼓励或者抑制、打压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个集权的社会体制中，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机制运行中的对象选择，当然与个人的族群身份密切相关，但又是自成体系、独立运作的因素。相关的部分内容在第八章已有所涉及。

第二，在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的国际交往局面，境外势力可以直接在中国各边疆地区进行渗透和开展各种活动，当少数民族精英与中央政府进行互动时，境外势力借助直接或间接的外交、经济、舆论的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内少数民族精英的政治或文化诉求，并对国内政府的施政行为产生某种制衡的作用。这一因素的作用不仅出现在互联网发达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现今世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外部势力对境内的族群互动和精英人物的命运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本书的内容，我只想指出两点。第一，本书在各章中对110名蒙古族精英的家族各类情况（阶级背景、教育、通婚等）的考察，是很有特色的，正是这一个个具体人物的思维和行动，决定了民国时期在内蒙古这个

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又一幕生动鲜活的戏剧。第二，最后一章对全书进行总结时归纳出了两个进程，即从内蒙古地方的行政建制和民众认同演变中展示出中国从“部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转型，以及在蒙古族地方精英的政治角色演变中展示出从“部族精英”到现代“国家精英”的转型。我认为，本书对这两个进程的分析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近代中国变迁的脉搏。

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思想现状和政治文化认同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型为一个具有自己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民族国家”。在1911年至1949年之间，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坚持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和政治制度/特别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全国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全力抗战。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族理论和相关的制度政策方面与之前的民国时期相比，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中国基本上参照的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的民族体制和政策，在50年代，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各传统部族先后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在各少数民族群的传统居住区设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同时人民政府采用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民族学校”）来培养各少数民族的精英人才，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斯大林“民族”理论和学自苏联的这一套制度和政策在施行了六十多年后，对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今天我国的这些年轻的少数民族精英是如何树立自己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的？他们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并如何定义今天的“民族主义”？他们在什么角度和立场上来看待现实社会中存在于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经济利益差异和权利差异？在他们的思考中，曾经出现在民国时期蒙古族精英中的各种思潮是否也会以某种形式重现？他们在这一体制下获得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对今天我国西部各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今天每一个关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中国人所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

历史是不能也无法割断的，清末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各地民族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包含了许多对今人的启示。尽管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中华民族在21世纪依然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严峻挑战。因此，加强各族之间的团结合作，

不断巩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民族凝聚力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我国各族青年精英在新世纪肩负的历史重任。常宝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共同回溯中国近代史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史，以史为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 参考书目：

《乌兰夫传》编写组，2007，《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常宝，2011，《“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

陈秉渊，2007，《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丁明俊，2001，《马福祥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费正清，1987，《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198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北京：商务印书馆。

关凯，2011，《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社会科学战线》第8期。

菅志翔，2011，《马麒的身份转换域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社会科学战线》第8期。

金耀基，1999，《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秩序的构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载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师纶，2006，《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孙隆基，2004，《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柯，2003，《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世纪中国》7月11日。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1993，《西北五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许宪隆，2001，《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牙含章，1963，《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牙含章，1987，《班禅额尔德尼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杨效平，1986，《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札奇斯钦，2005，《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大军，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

张磊、孔庆榕主编，1999，《中华民族凝聚力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汀阳，2005，《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绪 论 .....                                        | 1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方法论与框架 .....                           | 2   |
| 第二节 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理论及其概念的界定 .....                     | 14  |
| 第三节 精英理论及其概念的界定 .....                            | 24  |
| 本书基本结构与使用的资料 .....                               | 33  |
| <br>第一章 制度性社会变迁：清末国家政策与社会矛盾 .....                | 37  |
| 第一节 清末国家危机与对蒙古政策的调整 .....                        | 37  |
| 第二节 从抗税、拒征到反垦：清末蒙古地区民众的“反叛” .....                | 52  |
| 第三节 清末蒙古地区社会矛盾激化及其结构性因素 .....                    | 72  |
| 小 结 .....                                        | 76  |
| <br>第二章 族群身份 .....                               | 78  |
| 第一节 族群身份研究的视角：宏观与微观 .....                        | 79  |
| 第二节 蒙古地方精英族群认同的形成 .....                          | 80  |
| 第三节 社会分层及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社会流动 .....                  | 86  |
| 第四节 多族群国家体系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理论 .....                   | 90  |
| 第五节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困惑<br>——以清末民初驻京蒙古王公精英政治活动为线索 ..... | 98  |
| 小 结 .....                                        | 108 |
| <br>第三章 家族 .....                                 | 110 |
| 第一节 蒙古家族的特征及其社会分层意义 .....                        | 111 |
| 第二节 近代蒙古族精英家族（家庭出身）状况及其类型 .....                  | 114 |

|     |                                        |     |
|-----|----------------------------------------|-----|
| 第三节 | 近代蒙古精英家族及其社会地位流动 .....                 | 120 |
| 第四节 | 近代传统家族的衰退及其后果 .....                    | 130 |
| 小 结 | .....                                  | 134 |
| 第四章 | 教育 .....                               | 136 |
| 第一节 | “教育”的定义 .....                          | 136 |
| 第二节 |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                   | 140 |
| 第三节 | 近代新式教育影响下的地方精英流动模式 .....               | 149 |
| 第四节 | 新式教育与近代蒙古地方精英的流动 .....                 | 154 |
| 小 结 | .....                                  | 169 |
| 第五章 | 婚姻 .....                               | 171 |
| 第一节 | 婚姻的社会学认识 .....                         | 171 |
| 第二节 | 清朝满蒙联姻制度 .....                         | 173 |
| 第三节 | 个案：亲王僧格林沁家族与清皇家之间的联姻关系 .....           | 180 |
| 第四节 | 近代婚姻观念的变迁及蒙古精英的社会流动 .....              | 184 |
| 小 结 | .....                                  | 189 |
| 第六章 | 社会关系网络 .....                           | 191 |
| 第一节 |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与中国的研究 .....                   | 192 |
| 第二节 | 蒙古地方精英传统流动网络及社会资本 .....                | 195 |
| 第三节 | 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衰竭与新型社会资本的生成 .....            | 198 |
| 第四节 | 清末民初蒙古地方精英社会关系网络分类及分析 .....            | 205 |
| 小 结 | .....                                  | 213 |
| 第七章 | 民族主义 .....                             | 215 |
| 第一节 |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汉人“民族主义”思想基础 .....          | 216 |
| 第二节 | 汉人地方精英的“崛起” .....                      | 228 |
| 第三节 | 蒙古族：从“族群性”到近代民族、民族主义 .....             | 244 |
| 第四节 | “现代”和“传统”：蒙古地区近代“族群民族主义”<br>两种叙述 ..... | 247 |
| 第五节 | 蒙古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外部条件 .....                | 258 |